

國家圖書館歷史沿革之探析

宋建成

摘要

本文敘述國家圖書館設立緣起、沿革、發展及成就。

一、前言

國家圖書館（原稱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22年在南京籌設，至今已有78年的歷史。籌備之初，國家迭遭戰亂，做為國家文獻典藏中心的中央圖書館隨政府輾轉播遷，藏書聚而復佚，散而又集，如是者再。其經歷之坎坷，環視並世圖書館中鮮有其比。真可說是生長於患難之中，而屢蹶屢起，在我國文化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

追溯中央圖書館的發展，大致可分為籌備創館、抗戰西遷及復員、遷臺復館、文化建設、網路及自動化應用等五個時期。自籌創迄今，其間雖播蕩流徙，由南京西遷重慶，復員後又由南京東渡臺北，三度搬遷，始終以保存民族文化，建設現代圖書館為職志而奮勵精進。在臺北市南海路復館，慘淡經營，適政府推動文化建設，得以遷建新館於中山南路，圖書館的發展蒸蒸日上。其後易名為國家圖書館，持續進行典藏國家文獻，弘揚學術，研究發展與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以穩健、堅定、踏實的步履，跨出每一步，勇往直前。

關鍵詞 (Keywords): 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

宋建成：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兼任副教授；E-mail：chienchungsung@gmail.com

二、籌備創館時期（民國22年至26年）

民國16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同年10月1日成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依「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規定，大學院得設圖書館等國立學術機關。^[1]民國17年5月15日至28日大學院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請大學院在首都「籌備中央圖書館」，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的庫藏，並為各地方圖書館的示範^[2]；同年10月24日改大學院為教育部。民國18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華圖書館協會也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年會，決議「呈請教育部，從速籌辦中央圖書館」。^[3]民國22年1月21日教育部兼部長朱家驊（交通部長兼任）^[4]「派蔣復璁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由交通部按月撥助籌備費2,000元^[5]；同年4月8日復令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4月21日租定南京沙塘園7號民房辦公，正式開始籌備。^[6]

民國22年4月24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暫行組織大綱》（共

^[1] 《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民國16年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大學院公報》1:1(1928.1)，頁49-50。

^[2] 中華民國大學院編，《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上海：商務，1928）；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3輯：429》（臺北縣永和：文海，1977影本），頁5，603-616載有關「中央圖書館」宣言及決議如下：

- (1) 「全國教育會議宣言」載：「為各地方圖書館的示範，並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的庫藏；就要有中央圖書館的設立。我們希望最短期間，首都的中央圖書館得開始籌備」。
- (2) 「籌備中央圖書館」，係將王雲五、韓安、南京特別市教育局三原案併為本案。辦法甚詳，包括經費、圖書徵集方法、組織和職責等，規劃完美。
- (3) 「請規定全國圖書館發展步驟大綱案」，劉國鈞原案。辦法（二）完成全國圖書館系統，首項即為「成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規畫國立圖書館，及各地國立圖書館之辦法」。
- (4) 大學院所擬建設之中央圖書館應迅籌的款購置國內外歷年出版專門研究學術之各種雜誌及貴重圖書以供各地專門學者參考案」，孫貴定原案。

^[3] 〈中華圖書館協會年會提案總目〉，《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6:5/6(1928.2)，頁17-18。
 〈協會第一次年會紀事〉，《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4:4(1929.2)，頁5-14。
 〈協會第五年報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6:1(1930.8)，頁5-6載：「蔣夢麟部長民國19年5月24日批覆：教育部正在計劃推行中央圖書館籌設，在該館未成立以前，於本年內成立中央教育館時，先在該館內設圖書部，蒐集有關教育之中外圖書陳列備用」。

^[4] 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民國21年2月20日到任。民國21年10月28日朱調任交通部部長，派翁文灝繼任，翁未就職，仍由朱兼。民國22年4月王世杰繼朱任。

^[5] 蔣復璁，〈國立中央圖書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7:3/4(1935.12)，頁559。

^[6]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臺北：該館，2010），頁2。

七條)^[7]，籌備處主任之下，分設總務及圖書兩組。「總務組掌文書、會計、庶務、建築等事宜」，「圖書組掌採訪、編目、纂輯、皮藏、閱覽等事宜」，共有人員37人。^[8]必要時得設建築及購書兩委員會，延聘專家為委員（名譽職），協助進行工作。同年7月起，教育部每月撥給籌備處4,000元，計每年度支付日常費用共4.8萬元。^[9]經費既已確定，事業乃得以推進。

民國22年11月2日籌備處接管國學書局（原名江南官書局），易名為木印部，原書局雕版存於朝天宮，設發行部於南京雙井巷12號租用民房；又接收交通部移贈印刷所機器全部，另設工場於金沙井34號，「以便印刷目片及書籍等，兼資便利而裕業務」。^[10]民國24年1月10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印刷所暫行章程」，設總幹事一人，幹事一至二人，工務員若干人。印刷所分設木印部、鉛印部、發行部。^[11]自印所編館藏官書目錄、期刊目錄等連續性出版品。

民國22年7月籌備處以交通部所撥籌備費2,000元購下天津孟志清所藏舊拓金石拓片1,500種，11,139件，奠定了收藏金石拓片的基礎。^[12]

民國23年7月1日接辦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定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履行比京國際出版品公約（Brussel Convention），「開始辦理國際交換業務，以謀播通文化」^[13]，及充裕館藏外文圖書和外國政府出版品。

國立中央圖書館在籌設之初，只有由「教育部撥給北平檔案保管處留存的重要圖書4.6萬冊，滿蒙藏文書500冊，清順治至光緒年間歷代殿試策千餘本^[14]，

這些圖書作為館藏基本藏書。「其中可以稱得上善本的，只有一部明代刻本

^[7] 同註6。

^[8] 同註6，書稱「共有人員37人」。另同註5稱「有職員：主任一人，事務員十五，書記員六，練習書記三，共為二十五人」。

^[9] 《南京圖書館志》編寫組編，《南京圖書館志(1907-1995)》（南京：南京出版社，1996），頁285。

同註5。

^[10] 同註5，頁562-563。

^[11] 同註6，頁3。

^[12] 同註5，頁560。許廷長，〈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中國典籍與文化》，1995.3期，頁42。

^[13] 同註6，頁3。蘇精，〈從換書局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4：2(1978.10)，頁183。

^[14] 同註6，頁20。

同註5，頁560。

《仁孝皇后勸善書》，而圖書館購書的經費有限，不可能多所採購。^[15]爰通函黨政機關學會與世界各國重要學術團體，徵求出版刊物。^[16]並依教育部「新出圖書呈繳規程」，函各出版商呈繳書籍。民國24年2月15日籌備處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呈繳書目錄》，至民國25年1月停刊，共發行12期；民國25年2月起呈繳目錄併入《學觚》（民國25年2月創刊，民國26年6月停刊）中，不另刊行。^[17]民國26年7月8日國民政府修正「出版法」更規定出版品於發行時應由發行人呈繳中央圖書館乙份。^[18]另一方面選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精選孤本罕傳書231種1,960冊，定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於民國22年11月影印出版，擴大流通；籌備處將所得100部備供向國外交換西書。^[19]這樣，一個代表國家的國家圖書館便初具規模。

經過多方的徵集與交換，到民國25年9月1日，館藏中文書籍已達69,864冊，滿蒙藏文書500冊，西文書4,659冊，日文書551冊，金石拓片2,901幅，地圖427冊，雜誌15,480冊，其他圖書包括小冊子共6,550冊。到了民國26年抗戰發生時，館藏圖書及期刊已遞增到183,023冊，期刊報紙611種。^[20]

民國25年2月5日籌備處遷入南京市成賢街48號新購館舍辦公^[21]，各項業務

^[15] 蟬隱，〈蔣慰堂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18(1966.12)，頁1。
羅德運，〈蔣復璁：一個不應被忘卻的名字〉，《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8:5(1988)，頁92載：「每月經費為4,000元。除了3,000元用作分租、辦公和員工薪資，購書經費僅只千元，猶杯水車薪。」

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之初創與在抗戰期間的文化貢獻〉，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6.03），頁853-855載：「自1933年度起，核定歲入概算數48,000元，計分俸給費25,920元、辦公費7,800元、購置費12,720元、特別費1,560元」。

^[16] 同註5，頁560。

^[17] 陳友民、曾瓊葉，〈烽火歲月中之出版紀錄（民國22年至38年）〉，《國家圖書館館訊》，2003年1期(2003.3)，頁22。

^[18] 同註6，頁4。

^[19] 同註5，頁560。

同註15，羅德運文。

同註17，頁20載：「經委員會議通過影印四庫全書珍本目錄，計經部61種，史部20種，子部34種，集部117種，合計232種。」

^[20] 屈萬里，〈國立中央圖書館〉，《教與學》，1:1(1967.9)頁24。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簡史〉，《教育與文化》，351/352(1967.3)，頁4。

蘇精、周密，〈國立中央圖書館大事記—自民國22—29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2:2(1979.12)，頁67。

鄭肇陞，〈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14。

^[21] 同註6，頁3。

得以積極展開。同年5月5日編訂「暫行中文圖書編目規則」，8月17日編印藏書目錄片第一組出版；印售目錄片以500種（每種一張）為一組。9月6日開放閱覽，共分參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至民國26年8月15日抗戰軍興，日機空襲南京，被迫停止閱覽。自開放至停止適值1年，總共來館閱覽者有70,108人；圖書出納計中文51,355冊，西文3,083冊，共計54,438冊。^[22]同年8月31日將重要圖書裝箱封存262箱，運送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房妥藏；籌備處也暫時遷到他處辦公。^[23]

籌備處雖稍具規模，但仍屬權宜，成賢街館舍，原就不是圖書館建築，不足以發揮圖書館的功能，因此仍積極尋覓館址，籌建新館。民國23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會通過，准撥150萬元為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費用。^[24]民國26年2月1日教育部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委員會組織規則」（共九條），並聘請戴傳賢（兼委員長）、朱家驊、段錫朋、何廉、錢端升、羅家倫、梁思成、袁同禮、雷震、蔣復璁等10人為委員。^[25]同年3月9日及5月4日召集兩次委員會會議，討論徵選圖案及建築進行事項，決定館舍在是年秋興工建造，地址勘定在南京國府路（今長江路）四十六畝多土地為建館基地。建築設計計畫由梁思成、袁同禮、蔣復璁會同草擬，頗為詳密，可惜徵圖手續尚未完畢，而七七事變發生，建館乙事遂告中止。^[26]

三、抗戰西遷及復員時期（民國27年至37年）

民國26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8月3日擬定「非常時期內本處服務計畫書綱要」，為因應時局，並宣傳軍民戰時所需知識，10月8日編印《戰時國民知識書目》第1期（至民國28年8月17日停刊，共出27期，內容主要

同註20，鄭肇陞文，「籌備處在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的中央圖書館建築經費項下，運用8萬元購置成賢街4號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舊址」。

^[22] 同註20，蘇精、周密文，頁65、66。

^[23] 同註20，鄭肇陞文，頁9。

^[24] 同註5，頁563。

同註20，鄭肇陞文，頁14。

^[25] 同註6，頁4。

《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委員會組織規則》，見《學觚》2:3(1937.4)，頁54。

^[26] 同註20，鄭肇陞文

同註9，頁286。

爲軍事相關知識及其問題，每期以一問題爲主題的簡目）。^[27] 同年11月18日奉令西遷，籌備處自所置朝天宮262箱中擇要提取130箱，運往下關輪埠，開始離京，溯長江往上游行；12月13日南京淪陷，所遺存在南京的財產全部損失。^[28] 籌備處初奉令遷漢口，復奉命遷成都，又呈准在重慶展開工作。籌備處圖書輾轉舟次武昌、岳陽，由宜昌入川，而至宜賓。籌備處人員先於民國27年2月12日抵重慶，陸續商借重慶市川東師範學校大禮堂爲辦公處，租定重慶市上清寺聚興村民房爲所兼辦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事處，展開業務；另租定江津縣白沙鎮上松林爲疏散辦公地點，及該鎮傍三重堂存放原有裝箱的圖書。全部遷竣，乃於5月1日成立參考閱覽室，並特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9月4日分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29]

民國28年3月1日因重慶頻遭日機侵襲，籌備處再度奉令疏散至市郊各鄉鎮，參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籌備處疏散至白沙鎮上松林辦公，交換處仍留駐於重慶。^[30] 8月17日籌備處與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在白沙鎮合作成立白沙民衆閱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啓用。12月14日又於上松林設立西文參考閱覽室。^[31] 籌備處自遷至後方，每到一地覓屋辦公後，立即設法開闢閱覽室，對外開放，服務讀者，不曾間斷。

民國29年7月31日籌備處事務奉令結束；8月1日正式成立國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就任首任館長。同年10月16日國民政府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共十三條）。依該條例規定，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於教育部，掌理關於圖書的蒐集、編藏、考訂、展覽及全國圖書館事業的輔導事宜；設館長一人綜理館務，下分總務、採訪、編目、閱覽、特藏五組，各設主任一人。國立中央圖書館兼辦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事宜；並得設圖書館事業輔導

^[27] 同註20，蘇精、周密文，頁66、67。

同註17，頁23。

^[28] 同註20，蘇精、周密文，頁67。

同註12，許廷長文，頁44載：「存於朝天宮的原國學書局精雕木刻片150種，七萬餘片，全被汪偽軍當柴火燒掉。金沙井印刷所的印刷機器和鉛字等設備，均被日軍劫走。大部分圖書被日軍掠走或燒燬，損失慘重。」

^[29] 同註20，蘇精、周密文，頁67,68-69。。

^[30] 同註28，頁68-69。

^[31] 同註28，頁70-71。

委員會，以研討及實施全國圖書館事業輔導事宜。並視地方需要，得設分館。^[32]民國31年3月17日「國立中央圖書館辦事細則」奉令准施行。民國34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共十四條），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直隸於本館。^[33]時「有職員112人（包括交換處），工友21人」。民國36年12月考試院行政院聯合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聘任人員遴聘規則」（共九條）^[34]，為本館擁有高素質的館員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國27年4月10日籌備處遷移重慶之初，以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乃為全國政經中心，亦為西南文化薈萃之地，但卻無規模完備的圖書館，即計劃籌劃建立重慶分館以應需要。經呈准教育部同意即日籌建。同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建築委員會組織規則」，該委員會設委員五人，即教育部代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代表、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重慶市市長及籌備處主任。8月23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出席者有蔣志澄、杭立武、陳禮江、蔣復璁等四名委員。決定建館基地由重慶市政府指撥新市區兩浮支路第一苗圃全部分地；建築費擬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前撥的補助建築費項下暫行墊支。^[35]民國27年10月1日重慶分館工程開工^[36]，民國30年1月館舍落成，2月1日起日夜開放閱覽。^[37]由於本館在抗戰期間為西南各省圖書館的中心，而陪都舉行的文化活動，如各種展覽及學術會議，都在本館舉行，而被稱「戰時文化之宮」。^[38]

^[32] 〈制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民29.10.16），《國民政府公報》，29渝：302(1940.10.19)，頁1-2,4。

^[33] 同註6，頁6-7。〈修正「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民34.10.27），《國民政府公報》，34渝：892(1945.10.27)，頁1-2。案民國36年4月19日行政院訓令「各機關檢送書刊為數極少，咨令各機關按照規定檢送書刊，以利分送協約國等情」，附抄發「國立中央圖書館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事項辦法」（共十九條）（民36.1.29），見《國民政府公報》2805號（1947.04.22），頁6-7。

^[34] 同註9，頁10-11。《國立中央圖書館聘任人員遴聘規則》（民36.12.24），《國民政府公報》3020號（1948.01.01），頁6-7。案當時聘任人員有于振寰、彭道真、孫永齡、屈萬里、鍾靜夫（以上為組主任）、鄭振鐸、錢鍾書、王兆麟、呂紹虞（以上為編纂）。依「本館組織機構設置」，組主任5人，編纂14人，編輯15至25人，均聘任。

^[35] 同註28，頁68。

^[36] 同註28，頁69。

^[37]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簡史〉，《教育與文化》，351/352(1967.3)，頁4。

黃淵泉，〈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週年大事記要〉，《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6:1(1993.4)，頁200。

^[38] 鄭肇陞，〈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15。同註9，頁10。

鑒於抗戰期間，淪陷區許多珍貴文物都流入書肆中，日本、偽滿、美國都派人挾款大量採購。一些有心人士建議政府籌款收購以免散佚。教育部乃令籌備處運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原所撥補助建築費搜購古籍。民國29年1月1日蔣復璁動身，先於9日抵港與葉恭綽面商，決定於上海及香港兩地採購散出圖書。繼於1月14日潛赴上海，與張元濟（後由鄭振鐸加入）、張壽鏞、何炳松等商議搜購淪陷區古籍事宜，並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進行搶購。這是本館最大規模，也是最富意義的蒐購行動。自民國29年年初至民國30年年底，時值抗戰最緊急之時，展開秘密蒐購。^[39]「結果，江南各大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及順德鄧氏風雨樓、李氏泰華樓等舊藏珍籍，都被購得；其他久負盛名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吳縣潘氏滂齋、聊城楊氏海源閣等所散出圖書，亦網羅不少」。民國30年6月在上海為防止本批圖書在戰亂遭離散遺佚，乃擇33種孤本，予攝成照片影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玄覽堂叢書》（民國36年5月出版續集，收書21種附4種）。至於香港購得的書籍約341種，包括順德李文田收藏元明版書、莫氏五十萬卷樓、黃氏碧琅玕館、徐氏南州書樓藏本及其珍善本、敦煌經卷27種。^[40]適時購置善本古籍4,864部，四萬八千餘冊，普通本線裝書一萬一千多部。^[41]「文獻保存同志會」所購善本古籍差不多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數，「所不及者，惟宋元本及明代方志部分耳。其他經、子部分，大足並美，史（除方志外）、集二部，尤有過之，無不及」，量與質同樣驚人^[42]，成績可觀。惜因戰事，被日本掠奪。

另購番禺商氏所藏金文全形拓片699幅。所拓器物時代，包括商周至秦漢，可分為食器、酒器、樂器、尋常用器等類。^[43]

民國27年2月13日起籌備處兼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在重慶辦公，時有交換關

^[39] 同註28，頁71。〈蔣復璁報告赴港兩地布置搜購古籍情形簽呈（民29.2.27）〉，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73。

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979.11)，頁110-111。

^[40] 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搶救淪陷區善本古籍〉，《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年2期(2003.10)，頁127-129。

^[41] 同註39，蘇精文，頁114。

^[42] 〈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04)，頁88載：1941年3月19日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致蔣復璁函。

^[43] 蘇瑩輝，〈論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金文全形拓片的價值〉，《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16(1964.12)，頁9。

係39國。因華北及東南沿海盡被敵人佔領，交換書件改由海防與仰光進口，乃分設辦事處於昆明。12月6日籌備處與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外交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中華圖書館協會及學術團體代表等組成「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分向國外徵集圖書以補救各大學被敵所毀損者。其中關於徵得書籍的提取及收轉事宜，由籌備處交換處承辦。^[44]分配辦法，則由該委員會規定，以分佈在戰時五大學術中心地，即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城固的各專科以上學校為對象。^[45]籌備處編訂《國立各大學各學院書目》函送英美等國徵集圖書。^[46]將徵得圖書，分配給各院校使用。

民國32年8月13日教育部以本館於中外交通極為困難之際，多方設法徵集中外各種書刊，充實館藏；對閱覽室的增闢及各項展覽室的舉辦，也收到相當成效，特傳令嘉獎。

民國34年8月，抗戰勝利。本館將重慶分館的館舍設備及部分中文書籍移交給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處，還都南京；同年9月28日接收成賢街舊有館舍。^[47]民國35年8月19日本館前「文獻保存同志會」搶購為日本劫奪的善本古籍歸還，計有35,000冊；該年接收敵偽文化機關圖書及陳羣澤存文庫。^[48]復員後對古籍的蒐集更形積極，並迅速展開業務。該年6月24日南京總館閱覽室正式開放，設有普通閱覽室、參考室、期刊室、日報處及出納處。^[49]新闢中區及北城閱覽室。並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於南京，分設辦事處於上海。^[50]民國37年冬，本館擁有中外書刊852,745冊，其中普通圖書602,942冊，善本書153,414冊，西文圖書21,867冊，日文圖書74,164冊，金石拓本358冊，7,568幅。^[51]

^[44] 同註28，頁67、68、69。

^[45] 辜瑞蘭，〈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教育與文化》，351/352(1967.3)，頁32。

^[46] 同註6，頁5。

^[47] 同註6，頁7。

^[48] 同註47。

^[49] 同註47。

^[50] 同註38，頁16。

同註9，頁57載：「建國初期，本館奉令結束了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工作，但原交換處積存交換品很多。建國初期，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名望和關係，從國外還繼續寄來書刊，（中略）經文化部指示，轉贈北京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中略）凡各寄『南京中央圖書館』、『南京中華圖書館協會于震寰』等的信件書刊，直接由郵局轉寄北京圖書館」。

^[51] 同註12，許廷長文，頁45。

民國37年秋季，徐蚌會戰後，首都感受威脅，本館奉令精選珍藏文物裝箱運臺。民國37年12月26日、民國38年1月9日、民國38年2月22日分三批運臺（由徐鴻寶選定），共計644箱^[52]；「此次運臺雖未能如數運出，但善本已全部運出，計有十二萬一千三百餘冊，金石拓片也有5,600種，其他尚有甲骨殘片、銅陶瓷器、漢簡、寫本經卷、報紙雜誌等。重要珍藏都已來臺，所缺者為一般圖書及期刊」。^[53]運臺善本圖書文物先存臺中糖廠的倉庫，民國38年10月政府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本館縮減為該處的中央圖書館組；民國39年4月再移藏臺中縣霧峰鄉北溝庫房。^[54]

四、遷臺復館時期（民國38年至65年）

民國43年8月1日教育部令原館長蔣復璁籌備復館，9月正式恢復設置，除原「聯合管理處」中央圖書館組的圖書文物外，並將中央博物院組保管的前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18箱，交由本館代管；民國44年9月18日本館遷入臺北市南海路植物園原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55]民國45年2月開放局部閱覽，雖粗具規模，然而問題不少。^[56]首要問題，館舍原是日本時代建功神社舊址，而非圖書館建築。先驅逐白蟻^[57]，「舊有的房屋既多殘破，亦過狹隘，不能容納日益遞增的圖書，及配合閱覽交換工作的開展。自民國45年始即從事館廈的重建，因經費籌措不易，初則修葺，繼之以添建，更進而予以改造擴充，迄54年全部擴建完成，原有神社的房屋，已無遺跡可尋」。^[58]爰「將一所破舊，不連貫、不調和的建

^[52] 同註6，頁8。

同註9，頁95載：第一批120箱、第二批407箱、第三批121箱。三批共運走139,727冊，其中善本121,300多冊，包括原澤存[文]庫全部善本古籍4,352部41,311冊，內有日本版1,112種10,512冊，朝鮮版247種1,159冊。

蔣復璁，〈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意義與回顧——在朱家驊先生八六誕辰紀念會講演〉，《大陸雜誌》，56:6(1978.6)，頁1載：「[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本館等單位，一起將文物運臺]，共計3,824箱」。

^[53] 同註38，頁17。

^[54] 同註6，頁12。

^[55] 黃淵泉，〈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周年大事記要〉，《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993.4），頁201。

^[56] 蔣復璁，〈國立中央圖書館當前的問題〉，《教育與文化》，12:7(1956.6)，頁2。

^[57] 同註56。

^[58]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簡史〉，《教育與文化》，351/352(1967.3)，頁6。

築，修造成一個實用而有園池之勝的圖書館」。^[59]第二，圖書方面，「本館運來善本，足見珍藏之富，但普通書刊僅運來兩萬餘冊。本館開放閱覽，對於普通中文書籍的供應，最感困難，閱者不少，書實無多，如加採購，則既不易，價復奇貴，無法購置」。^[60]第三，人員方面，「本館恢復，僅設置員額15人，連同『聯合管理處』撥來本館原有員額5人，共為20人。然而工作之繁，實非此20人可作」。^[61]而本館組織與職掌仍循舊制，在組織上分設採訪、編目、閱覽、特藏、總務五組及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館舍既定，本館的業務和功能乃逐漸展開。爰依法開始向各出版業徵集出版圖書，並編輯《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出版「本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增訂修正版，供圖書館界編目之需。為介紹臺灣當時各館館藏，提倡學術研究，編製各種目錄及聯合目錄，以利圖書的利用。恢復外國出版品的交換，「美國國會圖書館得知本館復館，乃將1948年至1954年歷年所積存，應送我國的交換圖書99箱陸續運臺」。^[62]經常舉辦專題及特藏展覽，並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書展。設置「圖書館事業研究委員會」，研究圖書館的改進事宜，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改進與輔導，均著有成效。尤其是藏書方面，經12年來的徵購交換，「迄55年底，總數已增加到34萬冊。其中包括民國54年11月自美運回由教育部委託本館保管的原北平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2箱，20,738冊」。^[63]其餘是徵集、交換、採購所增的。也包括民國51年收購張溥泉遺書一萬七千餘冊，其中有宋元明刻及名家手稿等善本數十種。^[64]

民國54年9月21日蔣復璁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教育部派屈萬里繼任。^[65]時本館的困難，「最重要的是購書費不足、書庫不敷及編制的員額太

^[59] 同註56，頁3。

^[60] 同註56。

^[61] 同註56，頁3-4。

^[62] 同註38，頁18。

^[63] 案民國22（1933）年1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奉命將善本古籍等藏書精華裝箱南運，分存於上海、南京兩地。抗戰全面爆發，上海存書精華再由王重民、徐鴻寶挑選2,720種20,738冊，裝成102箱，自民國30（1941）年10月至12月5日分成10批全部運出上海。次年6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宣布該批善本書全數運抵華盛頓，即將開始攝制微捲。民國54（1965）年11月23日運返本館。經本館公開展覽後，暫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64] 同註58。

^[65] 同註6，頁16。載「民國55年9月21日本館卸任館長蔣復璁與新任館長屈萬里舉行交接典禮」。

少」。^[66]經衡量財力和人力，本館努力以赴下列工作：^[67]首為確定本館館藏發展重點，「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以既有的十四萬多冊善本圖書為基礎，再增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期使本館成為全世界研究漢學的中心」^[68]，其次，在「善本書的閱覽和傳佈方面」，邀集國內各大圖書館合作，從事「臺灣地區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包括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及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69]，以利中外學人查閱；民國57年2月擬訂「本館善本圖書申請影印及攝製管理辦法」，報奉教育部核定施行，俾供臺灣各出版社影印古籍，宣揚中華文化；同年7月成立「縮影室」，攝影館藏的善本書，以應各研究機構與讀者的需求。第三是民國56年5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

民國57年3月2日包遵彭接任館長，積極充實館藏，倡導館際合作，全力編纂參考工具書。民國57年12月7日及民國58年12月30日「中華民國公共圖書館館際圖書互借合作辦法」、「中華民國大學圖書館館際圖書互借合作辦法」先後在本館簽約。廣蒐各國目錄索引，民國58年元月成立「國家目錄中心」（民國60年7月9日易名「遵彭室」）。^[70]民國58年3月10日本館與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簽約，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目錄叢刊》第1輯12種；同年3月25日本館英文通訊《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ewsletter》創刊。民國59年1月《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創刊^[71]及出版《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按卡片形式排印，該兩種月刊，每年編彙編本。^[72]

^[66] 劉兆祐，〈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38。

^[67] 屈萬里，〈國立中央圖書館計劃中的幾件工作〉，《教育與文化》，351/352(1967.3)，頁1-3。

^[68] 同註66，頁38-39。載（略以）：「以本館短絀的經費，要收藏各學科的圖書，誠非易事。鑒於科技方面的圖書，大學多數已有豐富的書刊，本館沒有必要再重複購置，即便購買了，也難以超越國內著名的大學。」

^[69] 屈萬里，〈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臺灣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中國一周》，930(1968.2.19)，頁3-4。

^[70] 張錦郎，〈包遵彭先生大事年表（初稿）〉，《包遵彭先生紀念集》（臺北：包遵彭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集編委會，1973.2），頁206。

^[71] 張錦郎，〈包遵彭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42-47。

^[72] 張錦郎，〈包遵彭對研究與出版的貢獻〉，同註70，頁173。

民國59年8月15日李志鍾到任接事。為便利讀者閱覽，先後成立日韓文室、法律室、參考服務部門。^[73]民國60年5月1日開始編製國家聯合目錄，邀集14所重要圖書館，由各館將新編中文目錄片乙張，彙寄本館排列，供眾使用（至民國82年12月底停辦）。民國60年9月1日與出版社聯絡，推行「新書附印編目片」（至民國79年2月停止）^[74]，在新出版的書中刊印，以減少各館編目上的困難。他如創辦《中華民國政府公報索引》^[75]，以利法律法規的查檢。

民國60年10月4日本館設「圖書館學研究班」，歷時九個月，民國61年7月結業。同年7月15日配合國際圖書年，舉辦「第一次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有一百餘名各館代表參加。^[76]

民國62年4月6日諸家駿接任館務。同年7月16日開始全面攝製館藏善本微縮膠捲；10月22日將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改制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77]

五、文化建設時期（民國66年至84年）

民國66年3月31日教育部借調王振鵠擔任館長，民國71年6月復聘為第一任兼任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民國76年5月5日改稱漢學研究中心）主任。適民國66年9月政府宣布推動文化建設，本館乃積極規劃並爭取新館籌建事宜。民國67年10月行政院通過本館遷建案。其後經過三年的努力，辦理土地徵收、地上物拆遷^[78]、徵圖、設計、招標等項工作；新館於民國71年10月12日動土興工，迄民國75年9月28日落成啓用。本館自籌備處以來，五十餘年一直企盼有一所自己的館舍，至此終能實現。^[79]遷建工程奠定了本館發展過程中的基礎，自此伊始，各種服務一一展開。

民國69年4月，本館與中國圖書館學會為改進圖書資料管理作業，提高資訊

^[73] 同註38，頁19。

^[74] 同註55，頁203。

^[75] 李志鍾，〈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我〉，《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5:2(1993.4)，頁6。

^[76] 同註74。

^[77] 同註55，頁203。

^[78] 王振鵠，〈遷建委員會工作小組報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5:4(1983.1)，頁246載：「臺北市府原撥用的信義計畫項下土地，因計畫變更，民國68年8月另撥中山南路西側土地3,000坪作為館地。惟地上有建築物百餘所，有關土地之轉撥，地上物之拆遷，現住戶之安置補償，至為複雜。經一年八個月之努力，始於民國70年11月底全部地上物拆除」。

^[79] 蔣復璁，〈五十二年的盼望終獲實現〉，《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9:1(1986.5)，頁2。

服務品質，合作組織「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研訂「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報請教育部轉呈行政院核准實施。該「規劃委員會」的任務為研究、制定、推展、執行各規劃事項，由圖書館界及電腦專家二十餘人組成。所獲主要成就有：1.國家標準技術規範的制訂，包括中文圖書資料建檔標準規格，如「中國機讀編目格式」(Chinese MARC Format)、「中國編目規則」、「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國立中央圖書館文獻分析機讀格式」及「中文資訊交換碼」(CCII)；2.國家書目資料庫建立。^[80]民國71年12月本館成立電腦室，裝置王安VS100-16F型電腦，開始建立書目資料庫，展開書目資訊服務(NCLAIS)。本項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成功帶領我國圖書館中文圖書作業，由人工轉換為自動化；且順應時代潮流，利用電腦，進行合作與資源分享。這是華文世界(包括港澳星及大陸地區在內)第一個圖書資料自動化作業成功的範例。當時(截止民國76年6月)，本館書目資料庫，已有中西文書刊、期刊論文索引、政府公報索引、善本書總計二十四萬五千餘筆，奠定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及全國圖書資訊系統等索引目錄系統的基礎，使本館逐漸成為全國出版物最大的書目資料庫；另由於圖書館自動化作業需要，新編目規範替代傳統的規則，成為大學圖書館系「中文圖書分類編目」授課核心，使我國圖書館事業與發展，向圖書館自動化的目標推進。民國70年2月14日本館特舉辦「中文圖書資料自動化國際研討會」，發表我國圖書館自動化的成果，頗受各國讚評。民國71年8月澳洲國立大學及香港大學共同舉辦「中文書目自動化國際會議」，力邀本館遴選代表參加會議。^[81]同年10月為宣揚研究成果，本館特組團參加美國資訊科學會第四十五屆年會，舉辦「中文資料處理及電腦輔助華文教學」專題研討會，由國內與會代表發表相關成果報告10篇，各方反應熱烈。^[82]影響所及，民國72年3月14日在臺北舉行「亞太地區第一屆圖書館學術研討會」，各國相關人士反應熱烈，紛紛要求出席會議。^[83]凡

^[80] 胡歐蘭，〈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第二次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臺北：本館，1988)，頁83-87;91-95。

胡歐蘭，〈國立中央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之現況與展望〉，《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4)，頁34-36。

^[81] 〈圖書館界及資訊界學者專家參加澳洲中文書目自動化國際會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5:3(1982.10)，頁234。

^[82] 〈我國圖書資訊界組團參加美國資訊科學學會45屆年會〉，《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5:4(1983.1)，頁246-247。

^[83] 〈亞太地區圖書館學術研討會國內外圖書資訊界反應熱烈〉，同註82，頁248-249。

此，在在提升了我國圖書館界的形象。民國77年9月16日教育部又核定本館於科技大樓創設資訊圖書館，對資訊界提供服務。

此外，本館所提「籌設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計畫」，經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於民國69年4月22日核定，其業務遂交本館兼辦。^[84]該中心於民國71年元月創刊《漢學研究通訊》；民國72年6月創刊《漢學研究》及《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民國77年5月提報「協助海外學人來華研究計畫」，奉核於民國78年實施。並出版各種專書，舉辦各種國際性會議及出版論文集，辦理國際書展，以促進國內外聯繫，加強學術交流及漢學研究。

民國70年8月，本館經前往西德國際書號中心總部洽商，取得臺灣地區出版品的國別代號-957。民國77年10月15日行政院核定本館承辦「國際標準書號」(ISBN)工作；本館擬訂「國際標準書號實施及推展工作研究計畫」。^[85]

民國78年7月1日本館成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正式實施國際標準書號登記作業，為我國出版界提供ISBN服務；此項服務日後又與「出版品預行編目」(CIP)結合，而提高了出版界出版品送存率，有助於全國出版物的保存。

本館為增進國際出版界與我國出版界的交流，激起全民讀書風氣，推展「書香運動」，民國76年12月15日至21日由本館、行政院新聞局、幼獅公司聯合舉辦「中華民國臺北第一屆國際書展」假本館舉行。^[86]「臺北國際書展」年年持續舉辦迄今未輟。

為推動圖書館界的服務，推動圖書館法及各項圖書館標準。民國70年8月22日，本館等七個單位籌備規劃的「中華民國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於本館召開成立大會，以「建立館際合作關係，促進圖書資料之交流與利用」為宗旨。民國78年2月21日本館主辦「第二次全國圖書館會議」假本館舉行，以共謀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業務不斷創新，新創刊連續性出版物亦夥，除漢學研究中心所出版者外，還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中華民國行政機關出版品目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通訊》等。

民國78年8月1日楊崇森接掌本館。鑒於技術服務，是讀者服務的基礎，進行

^[84] 王振鵠、王錫璋，〈圖書館事業發展概述〉，同註80，頁6-7。

^[85] 林呈漢，〈我國實施國際標準書號的探討〉，同註84，頁9-11。

^[86] 汪雁秋，〈中華民國臺北第一屆國際書展舉辦的經過及其實質意義〉，《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0:1(1988.2)，頁6-8。

加速編目及建檔，擬訂「待編圖書整編三年計畫」，引進國外書目光碟片（CD-ROM），採抄錄編目（Copy Cataloging），加強電腦容量，提高電腦反應速率。民國79年9月1日成立「書目資訊中心」，民國80年10月30日啓用「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線上合作編目系統」，與16所國立大學連線，互通有無，共同建立書目資料庫，冀能達到「一館編目，多館分享」的目標。民國79年2月行政院核定本館辦理古籍整編計畫，為期五年，包括標點善本序跋、題跋、編輯古籍提要索引、選印善本古籍。

在閱覽服務方面，實施多項措施，加強讀者服務。如新增輿圖室、視聽室等閱覽室。將讀者申辦閱覽證服務臺移置讀者主要進口處附近，採電腦處理，隨到隨辦，也可用通訊方式申請；閱覽證改為永久有效，讀者資料若有異動，隨時鍵入電腦修正。實施「一證通行制」新措施，讀者入館時，僅需在入口處出示閱覽證，經光筆掃描該證的條碼，即可通行各閱覽室，手續簡便。將採訪組業務屬讀者服務的期刊及官書（政府出版物）部門改隸閱覽組。製作「電腦輔助讀者指引」，讀者可自行查詢使用以瞭解本館閱覽室及館藏分佈等各項服務。策劃好書交換活動，造成社會熱烈迴響。由於各種新猷，加強了服務，民國79年榮獲教育部為民服務工作優等獎。^[87]

民國81年5月5日曾濟羣接任館長，大力推動館藏自動化、數位化。惟本館組織條例自民國34年10月修正公布以還，50年未予修改。新館落成啓用以來，業務更形繁複而多元。民國77年7月，行政院為提升本館的服務品質及因應未來業務的發展，乃向立法院提出「本館組織條例修正草案」，雖然立法院審查會通過「本館直屬行政院」；但教育部認為仍以隸屬教育部為宜。因此，本草案乃被立法院擱置，以俟他日的協商。^[88]經本館各方溝通，民國85年1月5日及9日進行二、三讀會，通過「本館組織條例」，本館易名為「國家圖書館」；此外，繼續原有本館組織架構中的採訪、編目、閱覽、特藏組，並將原行政院核定任務編組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與書目資訊中心予以法制化，正式稱為中心。出版品國際交

^[87] 楊崇森，〈邁向一流的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現況與前瞻〉，《實踐》，818(1992.1)，頁12-16。

楊崇森，〈和時間賽跑，為館務奔波〉，《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5:2(1993.4)，頁11-13。

^[88] 曾濟群，〈回首來時路那燈火闌珊處—記在國家圖書館服務的片段〉，《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1(2003.4)，頁12-13。

曾濟群，〈國家圖書館組織法的立法過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8:1(1996.2)，頁1-4。

換處納入新組織法，新增四個業務組，即參考、資訊、輔導、研究組。^[89]本組織法的通過，也代表本館邁向資訊時代的新紀元。民國85年4月21日本館正式改稱「國家圖書館」，英文館名仍沿襲舊稱。

適政府推動「國家資訊及通訊基礎建設」，責成本館開發推動「遠距圖書服務」，本館乃繼開創「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系統」及「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光碟系統」，分別榮獲「1993年及1994年中文資訊產品創作大賽」十大傑出資訊產品獎，再推出「遠距圖書服務系統」(Remote Electronic Access/Delivery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簡稱READncl)，除提供索引目錄資料外，並將檢索到的索引目錄資料透過網路在線上獲讀原文，甚或列印。本系統的資料內容，為1.期刊資源：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國家圖書館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2.政府文獻：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系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報告書影像系統、中華民國政府公報全文影像查詢系統、國家圖書館新到公報目次服務系統；3.專題文獻：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當代藝術作家系統等九大系統。截至民國86年6月，共有建檔資料1,128,446筆，影像資料統計量達2,521,327頁，共181片光碟。這是本館與工研院電通所合作，以自動化技術彙整我國各類圖書文獻資源，建立完整國家索引目錄電子資料庫體系，進行國家文獻原文電子化儲存，妥善保存我國各類學術研究成果，具有豐富的內容(knowledge contents)，透過連線，提供國內外所需的網路資源，確能朝向「無牆圖書館」的理念推進。^[90]本系統應邀參加資訊月「主題館」巡迴北、中、南部展出，深受好評，並蒙人事行政局納入「革新楷模」報導。

還有「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National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Network, 簡稱NBINet)，用以達成書目共享的理想。鑒於原有Tandem系統已不敷需要，經在合作館下所成立「新系統功能需求規劃小組」決定，採用了「INNOPAC系統」^[91]，正式擔負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營運的責任，開啓了合作共

^[89] 《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民國85年1月31日公布)，《總統府公報》，6077號(1996.1.31)，頁1-3。

^[90] 宋建成，〈民國84年資訊月一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紀實〉，《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8:1(1996.2)，頁10-13。

^[91] 同註88，頁10-11。

享書目的新紀元。^[92]

民國82年9月23日在烏拉圭的中國國際圖書館十萬餘冊圖書，全部運抵國內贈予本館。案民國22年7月1日中國國際圖書館在日內瓦成立，民國38年底因中央政府已遷徙至臺北，該館館藏乃遷至南美洲烏拉圭，存放該國國家圖書館。這批藏書運回入藏本館，是本館在臺灣復館以來最大一次入藏圖書^[93]，也填補本館民國元年至民國38年出版中文圖書的館藏。

民國83年3月29日至4月4日本館承辦「1994年大陸圖書展覽」，這是大陸圖書在臺灣公開陳列展出的第一次，對兩岸的文化交流堪稱是一大突破。展出來自大陸176家出版社出版圖書16,800種18,411冊；並有大陸出版業者102人組團來臺，可稱是一次大陸圖書具代表性的展覽。全部展出圖書贈與本館。同年5月19日本館增設「大陸資料室」，開架陳列大陸地區出版品，以方便民眾掌握大陸資訊，促進學術研究。^[94]

六、網路及自動化應用時期（民國85年迄今）

民國85年4月21日是本館六十三周年館慶，於本館正門舉行易名典禮，將館名「國立中央圖書館」改為「國家圖書館」，正式肯定本館為國家圖書館的性質，開啓本館的新里程。本館特全館開放兩天供各界人士參觀，以展現本館各項服務成效。^[95]

民國87年4月10日莊芳榮接掌本館。先後設參考組、輔導組、研究組、全國期刊文獻中心。

本館自易名後的10（民國85年至民國95年）年，館藏由208.7萬冊（件），增加到310.9萬冊（件）。其間民國88年1月25日「出版法」廢止，喪失書刊送繳

^[92] 同註88，頁11-12。

^[93] 黃淵泉，〈中國國際圖書館六十年簡史〉，《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6:3(1994.8)，頁15-19。

^[94] 宋建成，〈大陸資料室的誕生〉，《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6:3(1994.8)，頁11-14。
林培齡，〈當彼岸的文字登錄此岸—記1994大陸圖書展覽〉，《出版流通》，29(1994.5)，頁7-12。

翁慧珊、簡家幸，〈「一九九四大陸圖書展覽」紀實〉，《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6:2(1994.5)，頁12-14。

^[95] 簡家幸，〈國家圖書館開放民眾參觀，慶祝本館63周年館慶〉，《國家圖書館館訊》，85:1(1996.5)，頁20-22。

的法源，經多方努力，民國90年1月17日總統公布施行「圖書館法」^[96]，再取得出版物送存本館的法律依據。本館乃大力宣導出版物法定送存的意義及重要性，並透過本館國際書號中心自動化作業系統持續整理出版人尚未送存清單，以催告補送，送存率逐年提升。加以多元徵集典藏灰色文獻，蒐購保存臺灣先民舊籍，採訪公私特色專題性收藏，引進國內外重要電子資料庫。為縮短城鄉間數位落差，開辦「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業務，為各縣市鄉鎮圖書館購置適合民衆一般性需求檢索的優質電子資料庫（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版）36種，及在全省及離島辦理近百場的資訊利用教育訓練課程，以利民衆共用資料庫的使用。^[97]

民國89年2月起，本館與政治大學合辦「國家圖書館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後改名「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並與中山大學合辦「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分別招收圖書館在職人員。^[98]同年12月25日建置「遠距學園」非同步網路教學平臺，推展遠距教學，提升民衆資訊利用素養及圖書館員在職訓練。^[99]同時在全國巡迴辦理「遠距教學資源網研習會」，讓各地民衆、學校師生及圖書館人員，獲便捷利用本項數位學習資源。同年年初，為整合國內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將科技、人文社會、大陸資料等三個館際合作組織整合成「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組織」^[100]，持續辦理各項館際合作事宜。

民國89年12月1日本館舉辦「第三次全國圖書館會議」，探討圖書館相關問題，並研擬未來發展方向。^[101]本次會議催促了「圖書館法」完成立法。民國90年10月15日教育部指示本館依該法規定，辦理公共、大學、專科、高中、職校、國中、國小等七種類型的設立及營運基準的研訂；及至民國93年11月，已悉數陸續由各主管業務司審核發布。民國91年12月27日教育部公布（委託本館研擬）「中國機讀編目格式」、「文獻分析機讀格式」、「詮釋資料格式規範」、「資料數位化與命名原則」、「數位圖書館分散式檢索協定」、「資訊檢索服務與協

^[96] 《圖書館法》（民90.1.7），《總統府公報》，6377(2001.1.17)，頁27-29。

^[97] 彭慰、蔡佩玲，《豐富全民資訊宴饗—92及93年度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採購》，《國家圖書館館訊》，93:2(2004.5)，頁22-24。

徐小鳳，〈「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種子教師培訓成果報告〉，《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通訊》，35(2004.9)，頁2-15。

^[98] 同註6，頁42、44。

^[99] 牛惠曼，〈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國家圖書館館訊》，91:2(2002.5)，頁28-33。

^[100] 同註6，頁42。

^[101] 同註6，頁42。

定」等技術規範。^[102]民國94年12月研訂六年的「中文主題詞表」及「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九版（賴永祥將該書著作權授予本館）均告完成。

民國91年12月27日教育部公布「圖書館輔導要點」。在公共圖書館輔導業務方面，本館於民國91年至民國93年間共訪視143所圖書館；並分別於民國92年與民國93年辦理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各表揚67個及89個績優館。鑒於基層圖書館員的旅途奔波及出差不易，推動「在地研習」方式，民國91至民國92年共辦理四十多場，培訓約二千五百位來自全省各地圖書館工作人員。民國93年又推出「圖書館專業團隊駐點輔導與服務」，邀請圖書資訊系所師生及圖書館界的資深工作者，組成13個專業團隊深入偏遠鄉鎮，直接到館與館員及相關人士共同討論該館營運問題並提供諮詢服務，共計輔導78個鄉鎮（市）圖書館，深受（84.2%）肯定。

由於積極爭取各項專案經費補助，如「圖書館事業發展三年計畫：知識資源基礎建設」（民國91至民國93年）及受邀參加「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兩個五年計畫，在本館同人的羣策羣力，努力不懈之下，已由早年圖書館自動化以建置索引目錄資料庫為主，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踏進發展全文影像資料庫，提供數位圖書館服務，本館已成為我國最大的圖書知識書目與全文資訊系統提供者，為國人學習、進修、教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圖書資訊主要來源。建置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資訊圖書館三個全球資訊網站，作為進入本館典藏的大門；而以華文知識、臺灣研究兩入口網，作為整合本館自建所有系統的入口，扮演著入本館寶山的登山口角色。發行《全國新書資訊網》、《編目園地》、《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三種電子報；並啟用「參考服務園地」。自建館藏各式資料庫，計分圖書書目資訊類、期刊報紙資訊類、學科專題目錄類、摘要全文類、綜合影像全文類、特種影像全文類、專題數位影音類、網路服務系統類。^[103]除了持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系統」（民國96年1月啟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新網站）外，建置了「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及「About Taiwan資訊系統」，後者建置三個以臺灣為主體的資訊系統，包括紀錄過去的「臺灣記憶系統」（Taiwan Memory），展現今日的「臺

^[102] 同註6，頁43、45。

^[103] 林昭君，〈國家圖書館電子資料庫系統介紹〉，《國家圖書館館訊》，91:2(2002.5)，頁34-36。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體質轉變的十年》（臺北：該館，2006），頁27-28。

灣概覽系統」(Taiwan Info)及「走讀臺灣系統」(Window on Taiwan)。也由紙本進入影音,先後完成「臺視晚間新聞」、「華視新聞雜誌」等數位轉製,成可在網路傳輸的新聞影音資料。截至民國94(2005)年底,各主要資訊系統資料建檔量達到638萬筆,掃描影像達到二千八百四十四餘萬頁影幅。網路系統使用人次,由民國85年全年158萬人次,進展到民國94年6,416萬人次,成長了近41倍;以該年為例,每秒鐘就有2人次,每天有17.6萬人次使用本館的資訊系統。^[104]上述統計尚不包括「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版的利用在內。搜尋引擎業者常希望透過連結本館的資料庫,以增加其檢索結果的學術性,如SINA新浪網、Google、Yahoo!奇摩,將使本館圖書資訊整理成果,發揮更大的成效。

由於本館自動化、數位化的卓越成就,獲得國內外肯定,進行多項合作計畫,如民國93年11月與美國猶他家譜學會(GSU)簽訂合作協議,獲得該會授權,將九千多種臺灣地區族譜微捲,進行數位化掃描及分析建檔,日後可經由本館免費提供民眾非營利性的個人研究使用^[105]民國94年3月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進行該館館藏中文善本古籍的數位化工作,本館派員在該館內工作,本館可獲得回贈該善本古籍數位檔。^[106]本館並與OCLC公司合作,將「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系統」的書目測試資料,提供OCLC測試,以求在該公司系統中,查檢到國內77個合作圖書館的中外文藏書資訊,本館在兩年內完成了CMARC與MARC21對照表及轉換程式;並於民國96年起成功地先行提供本館所分類編目約三十萬筆新進中文出版圖書書目檔匯入OCLC的WorldCat系統^[107],以利美國及其他國家各大學東亞圖書館對我國出版圖書的採訪及編目作業,朝向華文書目國際化發展。民國95年7月19日與「全球記憶網」(Global Memory Net)(主持人陳劉欽智)簽訂合作協議,將本館館藏日治時期明信片影像檔及古籍影像檔,共500幅上傳作為該網有關臺灣記憶內容的一部分。民國95年8月29日與蒙古國

^[104] 同註103,頁27。

^[105] 陳美桂,〈猶他家譜學會在臺蒐集族譜報告〉,《臺北文獻》,直字81(1987.9),頁229-270。
俞小明,〈國家圖書館與美國猶他家譜學會「臺灣地區族譜數位化」合作紀要兼談其家譜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館訊》,94:4(2005.11),頁26-31。

^[106] 張圍東,〈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國際合作數位典藏計畫: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例〉,《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5:4(2009.10),頁99-110。

^[107] 吳英美,〈OCLC及美國圖書館參訪紀實—兼述書目國際化工作〉,《國家圖書館館訊》,95:3(2006.8),頁24。

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協議。^[108]民國95年9月與歐洲經貿辦事處簽署「EUi」協議，本館成為歐盟文獻的寄存圖書館。^[109]

在國內合作方面，如民國93年李梅樹手繪三峽祖師廟設計圖稿整理計畫^[110]、民國94年3月臺南市立圖書館館藏日據時期臺灣舊籍數位化計畫^[111]；其他還有與臺北市文獻會、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等合作，以求地方文獻資料庫的建置。行政院研考會及客委會也與本館合作進行地方（縣市）政府公報及客家資源的數位化專案。海峽兩岸圖書館的交流互動，也趨於頻繁。民國87年6月17日至19日香港召開「區域合作新紀元：海峽兩岸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研討會」；民國88年8月30日至9月1日本館舉辦「華文書目資料庫合作發展研討會」，兩次會議與會者都倡議合作。同年11月4至5日香港召開「兩岸五地華文資料庫合作計畫會議」。民國89年6月7日在北京召開「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選定八個合作項目，其中「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由本館主持（該合作會議持續迄今）。^[112]其他如大陸地區國家、公共、大學圖書館人員互訪，書刊交換，使本館與漢學中心的交換業務開拓了新方向。

教育部訂頒「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冀能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本館乃於民國88年4月26日結合各級圖書館推動讀書會活動^[113]，讀書活動頓時成為風潮。民國90年起辦理「愛鄉！讀鄉！公共圖書館推動閱讀計畫」，藉由閱讀激起民衆探究故鄉源流掌故的興趣，瞭解家鄉的歷史、特色及風土人情。本項活動由各縣市文化局（中心）、圖書館及文史工作室等單位，合作辦理五百多場閱讀活動。民國93年9月17日在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辦理「我家的另一間大書房—蛻變中的公共圖書館」博覽會^[114]，活動以圖書館利用與終身學習為主軸，讓公

^[108] 莊芳榮、俞小明，〈國家圖書館與蒙古國家圖書館合作締約紀實—兼述韓蒙兩地圖書館參訪〉，《國家圖書館館訊》，95:4(2006.11)，頁8。

^[109] 同註6，頁56。

^[110] 同註6，頁51。

^[111] 何培齊，〈國家圖書館與臺南市立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舊籍數位化」合作紀實〉，《國家圖書館館訊》，94:2(2005.5)，頁12-14。

^[112] 盧錦堂，〈赴北京出席「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報告〉，《國家圖書館館訊》，89:3(2000.8)，頁11-14。

^[113] 同註6，頁41。

^[114] 同註6，頁49。

宋建成，〈我家的另一間大書房—蛻變中的公共圖書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68(2004.8)，頁4-5。

共圖書館成爲民衆生活領域的一部分。自民國89年至民國91年先後開辦「終身學習與圖書資源利用研習班」、「e起來耍庫—網路資源運用」等，介紹重要資料庫的使用知識。從民國89年起，《圖書館年鑑》改以年刊方式，每年出版一冊，收錄前一年圖書館界重要事件及活動，採條目體方式呈現，已成爲圖書館界的年度重要紀錄。另爲服務出版界除辦理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民國96年元月起全面實施ISBN13碼新制）及預行編目，並爭取到第二組國碼—986^[115]；參加申請國際標準期刊編號（ISSN），並辦理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管理業務。民國88年1月創編發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另自民國87年起將預行編目資訊開放予圖書館暨出版機構免費書目下載服務。

從國立中央圖書館到國家圖書館，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更是體質的轉變。這些轉變是多元集合而成，經由法令的制定頒布、政府的投入、數位化的進行、圖書館業務的輔導、技術規範的擬訂、閱讀風氣的倡導、國內外合作的推展等努力之下，泉流匯成江河。整體服務型態，已是提供紙本及電子資源的複合式圖書館服務。逐步實現了本館努力於「國家總書庫、國家總書目、文獻傳遞、知識入口網、館際合作、國際交流」的目標。

本館自民國96年3月至民國99年12月，館長三次更易，對本館中長程發展計畫的推展，不無影響。民國96年3月1日、民國96年9月17日及民國97年8月1日王文陸、黃寬重、顧敏先後擔任館長。

民國91年11月南部八縣市首長共同提案，建議國家圖書館於南部設立分館，行政院指示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方式，規劃南部分館，此後行政院經建會、教育部及本館數度召開南部館籌設會議。民國96年6月行政院研考會規劃我國中央政府所設立圖書館的整合工作，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及國立臺中圖書館加以整合，成爲國家圖書館的北部與中部兩個區域館，而尚未成立的南部分館如能即時設置，則我國國家圖書館的體系，將得以完整成形，使我國國民能夠普遍享有國家級的圖書資訊服務。同年12月教育部核准國家圖書館南部籌備服務處全年營運經費，館址暫時借用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圖書室，並指示於民國97年2月揭牌啓用南部館籌備服務處，開始服務南部民衆^[116]，惟因故未果。

^[115] 同註6，頁42。

^[116] 黃寬重，〈國家圖書館南部館籌設緣起與願景〉，《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9(2008.1)，頁4。

民國94年3月21日國民黨歸還實踐堂（臺北市延平南路），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鑑定結果，認為補強之後屬「堪用」，本館乃予以爭取，同年4月1日核定將作為本館分館之用。^[117]民國95年6月8日本館召開「延平南路館舍『藝術及視聽資料中心』營運諮詢座談會」。^[118]經報奉教育部分期核撥經費，將原屬階梯式的類電影院場所改建為合於圖書館所需的設施。民國97年6月臺北市建管處核發使用執照；同年10月27日該中心舉行開幕啓用。^[119]

民國96年7月23日本館辦理「2007年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座談會」，邀請越南國家圖書館、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河內國立大學圖書館、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等四位館長參與會議；簽署七項合作共識。^[120]民國97年5月越南國家圖書館派二位館員來本館等地研習古籍修護知識及技巧。^[121]同年12月3日本館贈書越南國家圖書館^[122]；並於12月7日分別與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河內國立大學圖書館及漢喃研究院簽署合作協議書。^[123]民國96年10月17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簽訂發展「世界數位圖書館」（World Digital Library）協議備忘錄，並在巴黎共同舉行展示會；本館應邀參加該會，會中展示本館提供館藏影像檔十幅。這是一個將世界各國文化資產匯集於一個網站，免費開放使用的國際計畫。^[124]民國97年7月本館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邀請，正式簽約加入合作館。民國98年4月20日至21日於法國巴黎舉辦正式公開啓用儀式暨合作單位會議。民國99年3月15日本館完成簽署世界數位圖書館章程（charter）；6月22日至23日在華府舉行合作單位首屆年會，會中本館提供31種文獻影像光碟，依例經本計畫美方技術及語文人員後製處理後，預計即可開放供全世界公眾使用。本次會議有76所圖書館或檔案館99位代表參加，開展了文化交流與合作^[125]的新頁。

^[117] 〈實踐堂國民黨終於還了〉，《大紀元報》，2005.4.14。上網日期：2011.4.5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5/4/14/n887800.htm>。

^[118] 同註6，頁54。

^[119] 同註6，頁69。

^[120] 同註6，頁59。

^[121] 同註6，頁65。

^[122] 〈辦理越南國家圖書館書展暨贈書交流活動〉，《國家圖書館館訊》，98:1(2009.2)，頁33。

^[123] 〈與越南圖書館界簽訂合作協議〉，見《中華民國98年圖書館年鑑》（臺北，本館，2009.12），頁296。

^[124] 蘇桂枝，〈參加「世界數位圖書館」展示會紀要〉，(97.01.18)。上網日期：2011.04.05。網址：http://210.241.21.164/Open_Front/report-detail.aspx?sysId=co9602680#e。

^[125] 俞小明、廖秀滿，〈參加「世界數位圖書館首屆年度夥伴會議」出國報告書〉，

民國96年3月本館為改善檔案管理方式與典藏環境，健全檔案管理制度，以參加行政院金檔獎評鑑作為努力的具體目標。歷經一年的參獎過程，本館榮獲第六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的殊榮，民國97年10月2日行政院舉行公開頒獎。^[126]

民國96年7月23日行政院研考會訂定「(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實施辦法」，本館經教育部考評列為優良機關(第一線服務機關)推薦參獎。「受推薦參獎機關應提出民國97年1月至11月的成果與績效，俾供評審參考。在『創新加值服務』構面所提服務內容，應完成規劃並具體執行，且執行在兩年以內(以民國96年1月至民國97年底者為限)」。^[127]本館經行政院研考會於民國98年2月17日完成受理46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推薦150個參獎機關書面評審，遴選46個入圍決審機關；並於3月5日至4月10日入圍決審機關實地評審^[128]，本館榮獲「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獎座。民國98年6月11日舉行頒獎典禮，馬英九總統親臨致詞，十分重視。這也是本館榮獲「94年度(第八屆)教育部服務品質績優獎」(95.7.19)、「95年度(第九屆)教育部服務品質績優獎」(96.7.25)^[129]，連續三年在為民服務努力的成效，受到肯定。

民國98年4月7日本館與國立臺北大學簽訂「學術聯盟」，將在該校規劃布置「漢學書房」，推動「寰宇漢學講座」^[130]，啟動了「漢學書房」計畫。

(99.7.20)。上網日期：2011.4.5。網址：<http://210.241.21.164/OpenFront/report-detail.aspx?sysId=co9902094#e>。

俞小明、廖秀滿，〈參加世界數位圖書館合作夥伴年度會議〉，《國家圖書館館訊》99:3(2010.8)，頁11-12。

^[126] 吳英美、張萬美，〈「檔案管理金檔獎」獲獎紀實〉，《國家圖書館館訊》，97:4(2008.11)，頁30-31。

〈榮獲行政院第6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同註123，頁64。

^[127] 行政院研考會，〈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注意事項」〉。上網日期：2011.4.5。網址：<http://www.rdec.gov.tw/DO/DownloadControllerNDO.asp?CuAttachID=17117>。

^[128] 廖麗娟、魏秋宜，〈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機制之探討〉，《研考雙月刊》，33:5(2009.10)，頁94-100。

^[129] 同註6，頁54、60。

教育部秘書室，〈教育部服務品質獎〉。上網日期：2011.4.5。網址：<http://www.edu.tw/SECRETARY/content.aspx?site-content-sn=1201>。

^[130] 〈搭建合作的橋樑：學術公開資訊自由—本館與國立臺北大學簽訂AA計畫〉，《國家圖書館館訊》，98:2(2009.5)，頁48。

該計畫係本館與國內圖書館界合作，「透過各項服務方式，建立彼此的合作關係，互惠效益，達成以倡導學術研究並推動人文閱讀（截至民國99年底有八個合作館）」。^[131]民國99年1月30日本館與耶穌會臺北利氏學社（Taipei Ricci Institute）舉行「共同成立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簽約儀式，該社將部分所藏3萬冊圖書寄存本館；本館成立「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閱覽區六樓）。^[132]民國99年12月28日至29日本館舉行「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以群策群力規劃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藍圖。^[133]

民國99年12月31日曾淑賢接掌本館第十三任館長。曾館長於交接典禮上期許能夠打造國圖及全國圖書館事業的黃金十年，讓本館成為國際上具有指標性的國家圖書館。將以圖書館經營的「卓越化」、「專業化」、「數位化」、「國際化」、「多元化」和「人性化」為主軸，進而提出六大願景與十四項策略，轉化具體行動而帶領國家圖書館邁入新的里程碑。^[134]

七、結語

本館自民國22年創立伊始，以迄38年舉館遷臺止，其間凡16年，因連年戰亂，輾轉播遷，自京而渝，再由京來臺，流離道途，備遭艱辛。民國44年在臺北市南海路復館，處物力維艱之時，百廢待舉，經費拮据，端賴館長擘劃有方，全體同人合作無間，在患難中勉力建設，館務次第開展，奠定了今日的基礎。

隨著國家經濟繁榮，社會進步，文化水準也年年提升，政府所擬定十二項國家重要建設，其中之一的文化建設計畫中，將遷建本館列為主要項目。民國75年本館新館於中山南路落成啟用，有助於本館的典藏與閱覽，改善其服務環境。此外，並增強了漢學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服務。漢學研究中心資料蒐集與本館館藏相

^[131] 顧力仁、莊健國，〈啓動「漢學書房」計畫開創院校合作新紀元〉，《國家圖書館館訊》，98:1(2009.2)，頁28、29。

〈漢學書房合作館〉。上網日期：2011.4.5。網址：<http://www.ncl.edu.tw/ct.asp?xItem=12049&CtNode=1755&mp=2>。

^[132] 〈耶穌會士與儒士相遇400年—記國圖與利氏學社成立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簽約儀式〉，《國家圖書館館訊》，99:1(2010.2)，頁50。

^[133] 高鵬，〈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紀要〉，《國家圖書館館訊》，100:1(2011.2)，頁10-15。

^[134] 國家圖書館秘書室，〈曾淑賢館長接棒國家圖書館迎向建國百年〉，（2010.12.31）。上網日期：2011.3.29。網址：<http://www.ncl.edu.tw/ct.asp?xItem=12944&cNode=1186&mp=2>。

輔相成，充實館藏內容，使之豐實合用，達到漢學研究重鎮理想。再者，推動圖書館中文自動化作業，帶領我國圖書館事業步入自動化時代，有利於圖書資料的處理與資訊的傳佈交流。在館舍、館藏及技術方法上，三者並進，全面提升本館的服務層次，也切實扮演國家圖書館在全國圖書館事業中的領導角色。

網際網路逐漸受到各方重視以來，政府推動「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並「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初期先規劃全民學習電腦，鼓勵獲得新知。本館亦規劃憑藉網路，提供國民終身學習的途徑。爰先後建置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含國際標準書號中心—CIP書目資料）、About Taiwan資訊系統等，開發華文知識、臺灣研究入口網，建立完整國家索引目錄電子資料庫體系，透過網路連線，提供文獻傳遞服務在內的各種數位化服務。從國立中央圖書館到國家圖書館，經過十年的努力，所締造出來的成果，使得本館不僅僅是館名的更易，更是全面體質的轉變。本館的服務型態，成功的由單純紙本轉向紙本與電子資源（包括圖像影音）兼具的複合式圖書館服務。

國家圖書館依據「圖書館法」規定辦理國內出版圖書資訊的送繳編藏，本身肩負典藏全國圖書文獻、編製全國出版物目錄的重責。做為全國出版圖書資訊的總書庫，本館的服務重在圖書資訊的保存與利用，以典藏與宏揚文化為目標，而館藏的充實為首要任務。同時也因其隸屬於中央，承擔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任務，本館的未來發展不僅要考慮到本身業務的需要，更應兼顧其輔導職能，在各圖書館業務輔導上帶頭領導，在技術規範及各項服務起示範作用。茲值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略述本館艱難建設的經過，並對現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更期盼政府給予本館適當人員、經費的支持，深信在本館目前雄厚的基礎上，益以近80年的優良傳統，必將輸出愈多的優質服務，使本館的發展不僅是一所國家文獻的典藏中心，全國圖書資訊服務中心，同時成為全國圖書館事業的領航者，更為國際間各國家圖書館重要的成員之一。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ung Chien-cheng

Abstract

The 78-year histor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egan with its establishment in Nanjing in 1933. During its early days, China was under the chaos of war,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erving as the national document archive, was continually relocated with each change of government. Time after time, its collections were split up, and then brought back together again, a turbulent experience seldom matched by any other library of the time. It can indeed be said that the Library grew up in adversity, and its rising and falling fortunes have left behind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s development can roughly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the War of Resistance, westward migration, and return to peacetime; relocation to Taiwan and re-establishm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puterization and the Internet age. Although the Library has wandered from place to place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the present day—from Nanjing west to Chongqing, and from Nanjing across the strait to Taipei following the return to peacetime—it has

Keywords (關鍵詞)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ung Chien-cheng: part-tim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 E-mail : chienchingsung@gmail.com

always aspired to be a modern institution and preserver of culture, forging ahead in pursuit of these goals with great vigor. Re-established on its old site on Nanhai Road in Taipei,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as kept running through painstaking effort. Finally, with a view to helping firmly establish culture, it was moved to its present location on Chungshan South Road, where it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flourish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 Library was later given its present name, and continues to archive the nation's documents, promote learning, and research, develop and guide the work of the island's libraries, advancing bravely into the future with steady strides.